

在華殉道的二十位法籍聖人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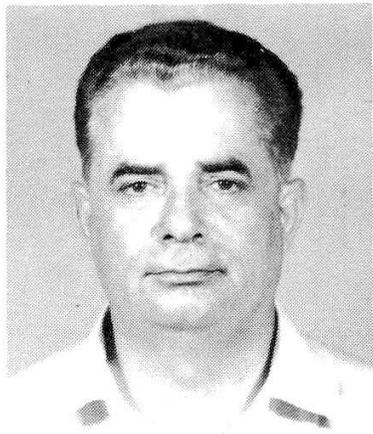
沙百里著

陳愛潔譯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十三位法籍傳教士在羅馬封聖，叫法國教會重溫它昔日對中國福傳事業所作出的貢獻，並反省它在今天仍能夠有什麼作為。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在某程度上已開放自己，與外國交流。然而，教會在傳播訊息方面依然有不少困難；這些困難是根深蒂固的，而殉道者的血使我們更能了解。

法籍的殉道聖人分屬不同的修會團體

·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一位主教和兩位神父：在多姆山省出生的徐德新(Gabriel-Taurin Dufresse)主教，來自羅納省的文乃耳(Jean Pierre Néel)神父，以及拉芒什的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神父。



- 一位遣使會士：生於格勒諾勃的劉格來 (François-Régis Clet) 神父。
 - 兩個方濟會士：來自阿爾比教區的德奧里 (Theodore Balat) 神父，和 Guebwiller (阿爾薩斯省) 的安振德 (André Bauer) 修士。
 - 四位耶穌會士：來自維爾尼城 (梅斯) 的任德芬 (Léon Mangin) 神父，里爾的湯愛玲 (Paul Denn) 神父，Roshomon (康布雷) 的趙席珍 (Reni Isore) 神父，以及阿爾薩斯的路懋德 (Modeste Andlauer) 神父。
 - 三位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修女：生於 Beaune 的艾明納 (Irma Grivot) 修女，Belle-Isle en Terre (Côtes d'Armor) 的那達理 (Jeanne-Marie Kerguin) 修女，和來自蘭特附近的盧昂的菊斯德 (Anne Moreau) 修女。
- 上述的方濟會士、耶穌會士和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修女都是一九零零年義和團運動的受害者。他們眾人把生命奉獻給中國，並熱愛中國，但是，

他們最終成了反對勢力的受害者。在中國，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福音的宣講面對各種深深植根於人性的障礙。中國文明的光輝亦有助解釋這國家為何拒絕騰出空間，接納一個向這古老智慧的成就提出疑問的生命觀。

中國的首次教區會議 (一八零二年)

四川的教會雖然面對不安和重重困難，仍相當蓬勃。教會從十八世紀的牧民經驗所得，編訂一套指南，概述基督徒生活的情况和聖事的施行。一八零三年，徐德新主教在成都以西約四十公里的崇慶州組織首次教區會議。與會者包括十三位國籍司鐸和兩位法籍司鐸。教區會議主要討論司鐸的職務和聖事。第十章講論司鐸的職務，勸勉他們熱衷靈修生活，並審慎處理現世事務。

四川教區會議的結果成了該省以及中國其他多個地區的宗徒工作指引，直至一九二四年召開上海會議為止。

教區會議後，教會只享有短暫的安寧。一八零五年，嘉慶皇帝採取更強硬的路線，開始迫害教會。對基督徒進行迫害，是基於儒家思想所強化的君主專制主義，也基於害怕外國入侵的心態。事實上，外國的確侵犯南部及東南沿海地區，而情況亦越來越危險。管理不善、貪官污吏斂財，導致民間紛紛起義，最終卻被當局用殘酷的手段鎮壓。

反對滿清的革命運動從道教和佛教的傳統取得靈感，並在白蓮教內創立特別的支派。部份來自這些純粹主義和愛國主義運動的成員皈依基督宗教。嘉慶（一七七六至一八二一年）和道光（一八二一至一八五零年）年間，情況更趨惡化。除了在京供職之外，外籍傳教士一概不准留在中國。基督宗教通常被列為邪教。這情況令基督徒經常面臨種種報復。不管在官吏施政苛刻或較寬鬆的省份，情況都是相若。外籍傳教會的宗座代表在傳信部的鼓勵下，嘗試成立一個教會架構，即使外國人一旦被驅逐後，福傳工作仍得以繼續。爲了成立地方教會，

傳教士須提名一位人士或傳道員負責照顧每個基督徒團體。他們在那些獲提名的人士當中，揀選最優秀的人才，作爲領受聖職的候選人。這些人士包括：孫本篤、蔣若翰，和曾經陪同梅(Jean Martin Moye)神父視察教務的趙榮。蔣若翰與趙榮在新開辦的龍溪修院僅僅受過一年的訓練後，於一七八一年晉鐸。由於趙神父的勇氣可嘉，范益盛(Pottier)主教派他往雲南的羅羅族處理艱鉅的教務。在嘉慶教難期間，趙神父被捕，受笞刑和掌嘴。他於一八一五年一月廿七日在獄中去世。

儘管一八零五年以來教難持續，但徐主教的轄區仍錄得每年約有二千名成人領洗。自一八一零年起，徐主教親自管理成都附近的崇慶州。這裡成爲欣欣向榮的基督徒團體的中心（今天仍可看到大聖堂，雖然在文革期間遭破壞，仍保存氣勢雄偉的結構）。四川總督對基督宗教採取鎮壓的措施。徐主教不斷四處遷徙。基督徒希望他自首。然而，邛崃縣一名新領洗的年輕人因承受不了鞭打之苦而告

密，供出主教的下落。徐主教於五月十八日被捕，先帶到新津，再押往成都，於一八一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北門外受絞刑。原先與他一起受刑的卅三名基督徒，其後被判充軍。

鴉片戰爭

徐主教為服膺福音而犧牲性命之際，法國因拿破崙戰敗而需要療傷。法籍傳教士得不到外來的支持。此外，英國嘗試與中國交往。但是，馬爾尼(Macartney)在北京(1793-1795)的使命最終失敗，完全揭示兩個帝國之間的衝突，各自唯恐失去本身的主權。英國人在華南廣東逐漸蠶食中國的大陸。英國人打敗拿破崙後，稱霸海上，一八一九年把新加坡建成一個自由港。他們隨意利用該處作為基地，把在印度生產的鴉片運往中國。他們用鴉片來交換茶葉，但也要求對方繳付金錢。鴉片生意持續擴展，不但損害吸食鴉片者的健康，也耗費公帑。皇帝下令勇敢誠實的林則徐總督遏止鴉片入口。

林則徐把一批批的鴉片拋入珠江，又燒毀倉庫。英國人迅速作出反應，炮轟華南的港口。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爆發，標誌殖民地侵略開始，中國被迫開放部份港口，讓外國勢力經商。法國政府意識到自己在經濟事業方面落後於英國，亦介入有關的戰鬥。在外國強迫中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中，法國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聲稱天主教傳教區常常受到威脅，於是充當傳教區的保護者。這樣的保護也許讓傳教區能夠發展教育和社會工作。另一方面，人們把外籍傳教會跟列強加給中國的侮辱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法國的保護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很多的益處，在極大程度上，他們被孤立於廣大的群眾當中，而地方官吏又能夠追捕他們而不受懲罰。□